巨鹿路 675 号

陆正伟

无论怎么去想，也不会想到巨鹿路 675 号是开启我“下半程”人生之地。与其相处的三十余年中，我目睹这座有着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爱神花园”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常走这条行人稀少的巨鹿路，经过 675 号时，总会对挂在大门两侧的十来块长长的白底黑字木招牌瞥上一眼，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而且都带“国”字头，对还没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人们来说，多少有几分“衙门”的威严和神秘。因此，我接到市文联通知时，有似曾相识之感，心里没起多大波澜。

报到那天，我身着军装，骑上崭新的二八自行车，一袋烟工夫就到 675 号门口。步入主楼黑白大理石铺地门厅，抬眼见银铜饰镶花边的衣冠镜，镜下摆了张欧式方桌，边上有座一人高的紫檀木立式打簧钟。细看，都是有年头的老货。我顺螺旋楼梯拾级而上，途中左侧有两扇彩绘玻璃长窗和百叶门，门外是圆形小阳台。上楼后，在组织组（205）办完手续，领到具有时代特征的工作证，打开红底金字的小本本，发证日期是 1982 年 12 月 25 日，编号：210。

接着，负责人老杨让老曹带我先认认门，熟悉环境。在拱券走廊里，老曹向我介绍说二楼有文联属下的影协、音协、剧协、作协等几家单位，我探头张望，见有的房间只放了两三张书桌。他还对我说三楼是《收获》《上海文学》杂志社及文联党组办公室。过后，他又带我到楼下沿着花园曲径小道走了一遭。除主楼外，大院西面有幢老资料楼和草坪南面刚竣工的四层水泥楼，火柴盒造型及灰扑扑的墙面，与颇有情调的主楼风格极不相称。据说是作资料楼用的。门前的草坪上有尊鲁迅先生手握书卷，坐在藤椅上目视远方的雕像。

主楼底层东、西、北及大厅是作协召开各种会议和举办活动的场所，可合可分。西厅与大厅间以移门相隔，原为房屋主人的餐厅，拱顶是镏金连枝花卉装饰和无数盏蜡烛灯围成的水晶吊灯。西侧有略高于地板的乐台，四扇五彩花卉玻璃窗，厅里摆放着几件老家具，如那张铺上台布作会议桌的大菜台，紧贴北墙的柚木酒橱，以及南窗靠墙的几张固定的皮沙发。

几天后，我在西厅参加集体学习，见一位操着北方话、头戴法兰西帽的老头主持。便问坐我身旁的老师，他随口就说，是写《红日》的吴强，文联的领导。我有些惊奇。这位老师可能觉得我少见多怪，于是，他指着乐台给我说起表演艺术家赵丹在此主持迎春联欢晚会的情景来了……

二

1980 年初，央视和上视及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在巨鹿路 675 号联合举行迎春晚会。程之、高博、康泰、于飞、向梅、梁波罗、杨在葆、吴海燕、毛永明、龚雪等三十多位老中青电影演员齐聚一堂，连闭门养病十八年的“影帝”金焰在夫人秦怡的搀扶下也赶来参加，盛况空前。一落座，金焰就说他过了年刚好七十，想出来为“四化”做点事。当赵丹关切地问秦怡这次在广州拍什么戏时，秦怡答道：“《海外赤子》，陈冲演我女儿。我给你讲过三遍了。”赵丹低头自嘲道：“老了，不中用了。”他蔫兮兮的样子，引来了大伙的笑声……

四十年后，耳闻过这台晚会趣事的我回头再看微信上这段视频，分外亲切，仿佛置身于其中。简朴、热烈的晚会上，电影表演艺术家们为大地复苏、文艺回春而欢欣鼓舞，摩拳擦掌准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可是，天不遂人愿，赵丹主持完这台精彩的晚会后不久得病了，当年 10 月 10 日去世，享年 65 岁。壮志未酬，那场在西厅的演出竟成了他表演艺术中的绝唱。

我庆幸的是，赵丹夫人黄宗英赠我的书中，有两本他的作品集，一本是茅盾题写书名的《赵丹书画选》，大画册扉页上留有赵丹之子赵劲的题签“阿劲珍藏。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是宗英大姐见我对赵丹书画十分喜爱，便说服儿子“忍痛割爱”转送给我的。赵劲继承父业，曾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是 78 级同学。我看过他多部或演或导的电影，见面时，我与他很谈得拢。没想到，2013 年，赵劲患病英年早逝，才 53 岁。每当我翻阅这本凝结着赵氏父子深情的画册时，总觉得心口憋得慌。

另一本是 2003 年出版的《赵丹自述》，宗英大姐在扉页上用粗笔书写“地狱天堂索艺珠。录阿丹诗句赠陆正伟先生赐存。黄宗英，甲申九·一七”。病房里没备名章，她急中生智，取出唇膏幽默地说：做一回“杨白劳”吧，说话间，已把鲜红的指印按在了书上。

三

1984 年末，我从文联调入作协。数月后，作协从市文联独立出来。原来的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变更为上海市作家协会。随着文联及各协会的搬迁，作协开始在大院里“腾笼换鸟”。资料室搬往新资料楼，西楼作办公用房。由于建制逐渐配齐，人多房少，党组、书记处的五六位领导同处一室。办公环境虽拥挤、逼仄些，但大家对“出人、出作品”的工作热情却不减，几个厅也就成了开展各种文学活动的“主战场”。

一次茶歇时，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对我说：“小陆同志，侬晓得哦，作协大厅是展现人生百态的舞台。”我进文联后不久，搞过“大事记”。因此，对作协的发展过程有个粗浅的了解。从五十年代批电影《武训传》起，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京剧舞台上出将入相，轮番上场。草婴先生是华东作协成立时入会的，在我眼里是元老级人物，经历的事情多，也遭受过不少苦难。我觉得他的话有他的道理。可我是改革开放初进作协的，所见所闻都是为文学发展、繁荣而展开，如举办“青创班”、文学讲座和作品研讨会、纪念会、各种庆典及文学交流等活动。

有时大厅也会举行颁奖仪式，我经历过 1993 年 4 月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授予巴老“资深作家敬慰奖”的隆重场面。巴老因病没出席，银质奖牌由女儿李小林代领。1995 年 4 月，该基金会在此又向柯灵、施蛰存、辛笛颁“敬慰奖”，这是我进作协后仅有的一次看到施老来此参加活动。那天格外热闹，两个“聋子”碰一起，有许多话要说，只能黄牛角水牛角各说各的调了，彼此间榫卯不合的交谈，引出了欢笑声。

我记得作协举行的纪念会中，数 1986 年 12 月 6 日那场“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办得有特色，而且规模也最大。不仅大厅开会，在西厅还举办了“郁达夫史迹展览”。这天，在参会者的提议下，来宾用毛笔在四尺整张宣纸上签到，签名的有于伶、刘海粟、柯灵、许杰、夏征农、李俊民、王西彦、吴强、杜宣、贾植芳、赵家璧、秦瘦鸥、肖岱、辛笛、罗洪、徐中玉、钱谷融等文学前辈耆宿。我想，这幅签名如保存至今，不仅是书法的珍品，而且是件不可替代的文物。那时，我见郁达夫之子郁云在西厅周旋于文学前辈之间，不时介绍着他父亲生前使用过的纪念物及从事文学创作的历程。

会刚开始，只见一位满头白发，戴着贝雷帽，身穿黄色鹿皮休闲装，很有文艺范儿的老先生匆匆走进会场。原来是画家刘海粟，与夫人夏伊乔一起来参会。我年前刚读过他撰写的文章《漫论郁达夫》，知道他与郁达夫是莫逆之交。散会后，刘海粟夫妇不忘到西厅“补课”，重温与郁达夫之交往。他看着陪伴在侧的郁云笑道：“见儿疑是父归来，你与达夫长得太相像了。”他边参观边回忆道：那时在南洋与达夫等爱国志士常聚在一起作画赋诗抒发爱国情怀，或卖画撰文募集义款支持抗日活动。一次，郁达夫说：海粟，如日军入侵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当晚，刘海粟与画友合作了一幅《松竹梅石图》，郁达夫挥毫题上一绝：“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刘海粟还说道：“郁达夫被害前，我作画他赋诗的情况有许多次。星洲沦陷后，那些宣扬民族气节的作品被收藏者销毁。每每想起，都深感痛惜。”

我不懂画，无法从海老的艺术成就上去评头论足。但我从他的文章和叙述中知道了他是郁达夫烈士的密友，单凭他在腥风血雨中不顾个人安危以画笔作刀枪与侵略者作斗争的勇气，就足以让我钦佩。

四

东厅是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及接待中外宾客以文会友的场所。厅里陈列着外宾赠送的礼品。厅内的陈设不失昔日之奢华，水晶大吊灯，柚木护壁，柚木拼花地板，钢窗，热水汀，应有尽有。数年前，墙上张挂起华东作协在巨鹿路 675 号成立时的“全家福”及历届主席夏衍、巴金、于伶、徐中玉、罗洛、王安忆的肖像照，在我眼里好似一支接力团队，文学发展的接力棒一代接一代传递了近七十年。

在东厅，我见过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西拉夫·克齐向诗人罗洛赠礼的情景。1996 年，罗洛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聆听了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的发言。回国后，在《文汇报》发表了一首赞颂诗。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把诗带回国。贝·布托读后十分感动，托大使从北京来到上海作协，送来了象征两国友谊的巴基斯坦艺术地毯……

解放初任夏衍秘书的李子云给我讲过，夏衍兼华东作协主席时，在东厅设了个“测字摊”，每周固定用一个晚上倾听作家、艺术家意见和建议。东厅也是我有幸初见夏公之地。1987 年 10 月，我不但用相机拍到了夏公看望沪上作家朋友的照片，次日还被《新民晚报》作为图片新闻刊于头版。“处女作”的发表，感觉特美好。（参见拙文《四见夏公》）

平时，东厅比其他厅相对安静些，但有时也会突然闹猛一阵子。像巴老百岁华诞的那几天就是这样，东厅成了读者向“人民作家”巴金先生致以祝福的地方。我参加过著名陶艺家徐秀棠创作的巴老塑像的交接仪式，也亲历了李小林接待来客时热情洋溢的场面。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女作家王旭烽，代表浙江作家朋友专程护送巴金发绣像来沪，在东厅交接，正在东厅等候的大家都想尽快一睹“真容”。小林同发绣像作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绣艺术传承人孟永国揭开红绸布的刹那间，厅内响起了掌声和欢笑声。这幅有巴老血脉的头发绣成的像如今张挂在巴金故居纪念馆里。

东厅有扇连通大厅的边门。大厅里的水晶吊灯被周边小吊灯如众星拱月般围住，南北对称的大理石门柱上鎏金柱头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南面是三扇宫廷式木框玻璃门。室外是大露台，上有古铜枝型吊灯，下有铜丝镶嵌花纹砖。与露台前四根罗马顶梁柱遥相呼应的是花园中的喷水池，也是匈牙利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这座中西合璧花园的点睛之笔。大理石雕像“普绪赫”亭亭玉立，举臂回眸，微风吹起薄如蝉翼的纱巾，线条流畅，充满活力。四个裸孩在石盘边抱鱼嬉戏，姿态各异，鱼嘴向雕像喷吐着串串水珠。池中金鱼在浮莲下游弋。普绪赫在神话中是爱的化身，这一花园也因而得名“爱神花园”。

如今雕像已成网红的“打卡”之地。常见有人驻足观赏奇石古树和繁花异草，也有坐在葡萄架下的欧式石椅上小憩的。更早些时候，我见过在此留影的有美国好莱坞影星格利高里·派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者、苏联剧作家鲍·瓦西里耶夫及来自宝岛台湾的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等中外文化名人。一次，我路过喷水池，有位老人站在边上，见眼熟，一问，原来是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先生。她说在等人。我一阵惊喜，转身跑回办公室，拿了一枚巴金纪念封，请杨先生留了个名。

这座“爱神花园”，原是沪上著名工商业者刘吉生在三十年代建造的私家花园，主楼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国外进口。解放初，刘家定居香港，产权捐给了国家。1953 年 11 月 8 日华东作家协会在大厅里宣布成立，从此，675 号便成了“作家之家”。如今在楼梯的铸铁护栏上还留有刘吉生英文名字的缩略语“KSL”。

我曾接待过从加拿大回来寻根问祖的刘氏后裔，陪他们楼上楼下转过一圈后，一位白发老者触景生情，指着光滑的楼梯扶手说，当年曾趴在上面顺螺旋形楼梯从三楼滑到底下。当他沉浸在童年美好回忆中时，我却想起另一件事——有一次，魏绍昌先生来作协，刚踏上楼梯，就对我说起老作家靳以在楼梯上滑倒骨折，后在巴金的提议下，楼梯铺上了地毯。

名声早已在外的“爱神花园”也成了影视圈内热门的拍摄场地。我接洽过港星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等多家摄制组，还旁观了《建国大业》的拍摄过程，其中有一组镜头至今让我难忘：张国立扮演的蒋介石和邬君梅饰演的宋美龄，在风声鹤唳中坐在二楼阳台的藤椅上，望着楼下水池中喷出软弱无力的水柱洒落在洁白如玉的普绪赫雕像上，夫妇俩神情沮丧，品尝着蒋家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苦涩滋味……

五

我进文联时，那幢刚竣工的水泥楼，是我“待分配”阶段的工作场地。老杨让我先帮助资料室搬家。干了没几天，我就发觉此楼墙面开裂泛潮，铁板焊接的载货电梯常卡在楼层之间等诸多不安全现象，明显是文革余波未平时建造的“册烂污”工程。

在帮助整理图书中，我才知道资料室书库里藏有许多“奇珍异宝”，特别是保存完好的三十年代文学期刊，是全国各地图书馆不能与之比肩的。

随着时光的推移，资料室的安全隐患日益严重。再者缺少保管图书资料所需的防霉、防潮、恒温等防护设施，使得纸质书籍和珍贵资料生霉、泛黄、发脆。一次，作协主席团走访巴老时，无意间说起资料室的状况，巴老听后没有说什么。

巴老不曾想到，这座资料楼使用不满十年就成了危房，几代人积累的资料、书籍将毁于一旦。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异常着急。

1993 年 11 月 23 日，市领导到寓所看望巴老。寒暄后，站在边上的我听到巴老说：“上海作协资料室藏有很多珍贵资料和藏书，能够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有些资料再要征集，也征集不到。但是作协资料楼属危房，保存条件极差，因缺乏资金难以改建，希望领导重视，加以支持。”不久，巴老替作协向市委转交“帮助解决资料楼扩建维修经费”的书面报告。

巴老历来很重视作协资料室的库藏，从他五十年代起捐助的几批版本书就可见一斑了。此时，巴老一面为改变资料室的困境呼吁，一面继续捐献以示支持。次年 3 月 21 日，小林来电说，捐给资料室的书已整理出来了，让我们去取。作为保管人员接受巴老捐赠我还是第一次。在他家，我和同仁手捧捐物同巴老还合了影。小林告诉说，这次爸爸把《随想录》版本书全给了资料室，连家中仅剩一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袖珍版本也一起捐了。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诗人罗洛得知巴老向资料室捐书捐物后，几次在我面前说：巴老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居住于上海，是上海的荣幸，我们理应照顾好老人家。他还说：巴老为作协改建出力，我们要珍视这份关爱，将来要把他捐赠的书稿资料陈列好，留给后人，教育后人。他的话既有对巴老的感恩，也符合巴老捐赠的初衷。

资料室里摆放着巴老九十年代捐赠的整整一柜子书，供大家借阅。我听巴老说过：“图书应该陈列、开放、让大家可以看到。不要把它当古董那样供起来。更不希望图书馆、资料室把它们束之高阁……”

1996 年 8 月，金炳华专程到杭州看望巴老，并通报了作协重建资料楼及创作中心楼的消息。在汪庄 2 号楼，巴老听到作协大院的改、扩建工程有着落了，连声称好。

此后的几年里，“爱神花园”渐渐发生了变化，两幢建筑风格与主楼相称的新楼拔地而起，赭红陶瓷外墙攀延着翠绿的爬山虎。巴金和老作家们在落难中开挖的防空洞被改造成地下停车库。沿街昔日“帮工”住的二层副楼拆除重建后，675 号大门的墙上又增添了一块“作家书店”招牌，店里时常举办文学讲座、沙龙和签售活动，咖啡飘香与书香不时拂面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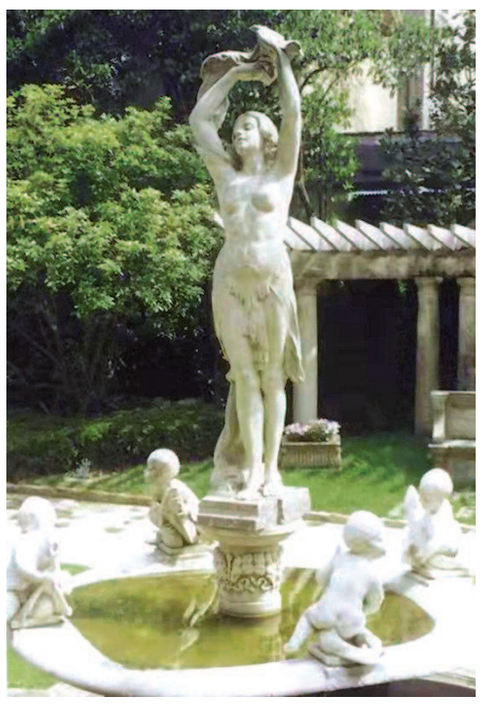
更为喜人的是，一直在外靠租房办刊的《萌芽》杂志社，随着作协办公用房的改善，1998 年秋也搬进巨鹿路 675 号，“归队”了。而今，在建筑大师邬达克设计建造的主楼中，《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上海文化》四家品牌文学杂志社各得其所，静心编发海内外的来稿，满足不同读者需求。

邬达克以超前的设计理念，使“爱神花园”历久弥新，被列为上海市历史保护建筑。但他可能料不到的是，这座精心设计的私家宅院后来会成为文人雅士聚集的“文学殿堂”，就像我与巨鹿路 675 号结缘那样，是出乎意料的。

2021.10.25。

1995 年 4 月，柯灵、施蛰存、王辛笛（左起），在作协大厅出席“资深作家敬慰奖”颁奖仪式

主楼里的螺旋形楼梯



邬达克设计的普绪赫喷水池

1986 年 12 月 6 日，郁云在西厅向刘海粟夫妇介绍父亲郁达夫事迹

从“斗草”说到车前子

萧宜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这是《诗经·周南》中的一首，是古代妇女在户外采集野草时所唱的短歌。

芣苢（fú yǐ），就是我们常说的车前草。徐锴《系传》说：“《本草》芣苢，一名车前”，《尔雅》郭璞注：“车前草，大叶长穗，好生道边，江东称虾蟆衣。”苏颂《本草图经》：“春初生苗，叶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长及尺余，抽茎作长穗，如鼠尾。”

这如鼠尾的花茎，我们小时候就用它作勾拉游戏。看谁把对方的花茎扯断，谁就赢了“官司”，在民间，这车前草，便有了打官司草的名字。

“打官司”这一游戏平淡无奇，小孩子家家却爱不释手，乐此不疲。此游戏，苏锡沪地区皆有流行。那天路过三泾南宅，见路边有几棵车前草，问一旁居民，他们随口而出：“打官司草。”足见他们小时也曾玩过。

这种斗草游戏，据《礼记·夏小正》：五月五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有“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可见，斗草是由端午节采集药草衍生过来的一种游戏，不过玩法各有不同。

宋苏州田园诗人范成大，曾写《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一首：

社下烧钱鼓如雷，
日斜扶得醉翁回。
青枝满地花狼藉，
知是儿孙斗草来。

便是写的斗草情景，孩子们斗草过后，地上一片狼藉。其时的斗草，是玩伴各各竞采花草，比赛多寡优劣。

《红楼梦》中的斗草，其六十二回写得很详细：

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满园玩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里。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一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兰’，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豆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要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是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拉扯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臊！”

二人斗嘴，你来我去谁也不肯认输，以致嘻嘻哈哈动起手来，最后大家一哄而散。

像她们那样玩斗草，要知道很多花草名，包括俗称和别名，也要懂得对仗。罗汉松，大家知道，是一种珍贵树木。但观音柳不是柳树，是一年生禾本植物，叫红蓼，面水临溪而生，因了一个别名，一草一木，观音柳，罗汉松，两两相对，便十分工整贴切。

这《诗经》里的“芣苢”，即车前草，到了我们手里，成了一种玩具，我们用它做“打官司”游戏，为我们的少年生活增添乐趣。

而古代妇女视它如宝贝，大家竞相采集，其原因，据传“服之能令人有子”（见徐锴《系传》）。闻一多先生解释说：“结子的欲望，在原始女性，是强烈得非常，强到我们不能想像的程度。”因此，她们欣欣然欢呼雀跃，歌唱着竞相采集也就不奇怪了！

车前子性寒味甘，能利尿。

汪曾祺先生在《草木春秋》一文中说了个趣事，说他在张家口那会儿，山西梆子剧团有个唱老生的演员，随剧团在几县各个镇子演出，但不受欢迎。农民给他起了个外号——车前子。因为他一出场，观众便纷纷离席，去上厕所了。